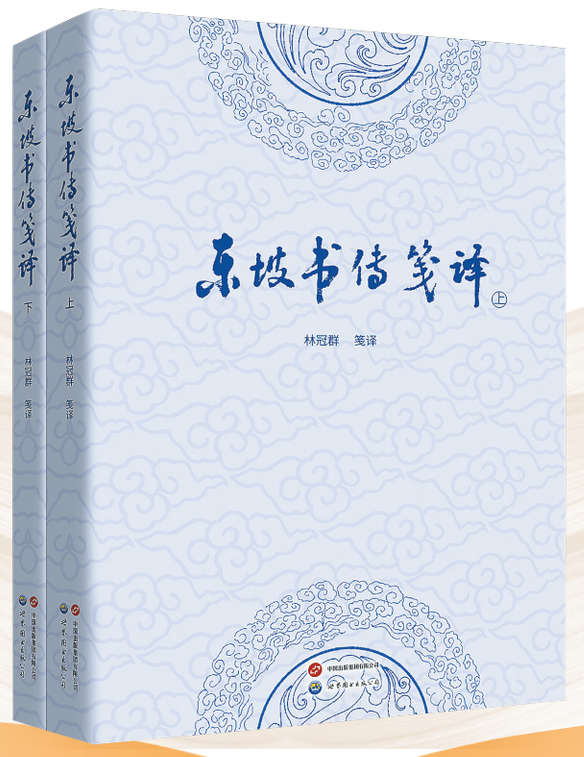
文化热点

《东坡书传笺译》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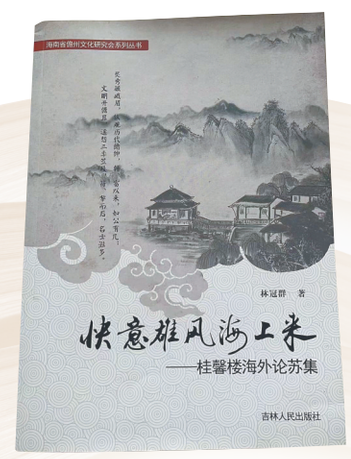
跟着苏轼读《尚书》

■ 本报记者 陈耿

林冠群编注的《新编东坡海外集》。



《东坡书传笺译》书影。



林冠群研究苏东坡的论文集《快意雄风海上来》。

【编者按】

5月26日下午，在北京市丰台区中华书局旁的“伯鸿书店”，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举办了《东坡书传笺译》（上下册、约79万字）的首发式。

该书是海南苏轼文化教育基金会和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规划课题成果，作者为海南资深的东坡研究学者、年逾八旬的林冠群先生。他先后耗时三年对《东坡书传》作了“笺译”。

海南日报记者应邀参加《东坡书传笺译》首发式后，采访了该书的作者、编审和有关专家学者，了解了该书出版的来龙去脉和学术价值。

《诗》《书》《礼》《易》《春秋》是我国古代典籍“四书五经”中的“五经”，其中《书》即《尚书》，“尚”通“上”，《尚书》就是上古帝王之书，是文字肇兴之后关于唐虞三代先王先圣的文献，也是先王先圣“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语录范畴的文献。

由于《尚书》流传年代久远，历代经学家虽对其进行注释和解说，但都着重训诂与繁琐考证，且多见解不一，莫衷一是，令古今读者难以解读。苏轼被贬海南、谪居儋州时，也曾对《尚书》作“传”，后世称之为《东坡书传》。“笺”是在“传”的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如林冠群的《东坡书传笺译》，不仅涉足《书》学领域，也属于苏学的范畴。

为什么选择《东坡书传》？

“历史上为《尚书》作传的作者和典籍很多，您为什么选择苏东坡的版本？”记者问。

“《尚书》作为两千多年来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政治读本，陶冶养成了中华民族多少代的英才志士、豪杰伟人，可以说是民族的精髓和养分，脊梁和血脉。”林冠群说，“苏东坡自少年时即随其父苏洵研习此经，纲领精义，了然于胸。后以此而高中进士，进入仕途。在四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在坚守儒家‘仁政爱民’的理念，八州迁转，一心为民；尽管宦海浮沉，依然不改初衷，以国是民生为己任。直至晚年屡遭贬谪，居儋期间犹奋笔著书，完成《东坡书传》一书的写作。正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言傥论，多载于此书。”

东坡写作《书传》之时，正值其晚年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生低潮时期，书成之后，不得不再三嘱咐友人“愿勿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那么，三十年后，谁是知音呢？

三十年后的南宋绍兴年间，《东坡书传》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福建进士林之奇是关注《东坡书传》的重要一员，他著有《尚书全解》一书，且书中大多数的篇章都提及东坡的观点，甚至大段抄录后加以评点；南宋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蔡沈，受朱熹委托编有《书经集传》一书，其中也不乏赞成东坡观点的地方。

林冠群说，林、蔡二人在学术上传承朱熹的理学，许多观点与东坡有直接的冲突，但仍不受门户之见接受东坡的某些看法，原因就在于东坡对《尚书》的诠释确有许多过人之处。朱熹对《东坡书传》也颇为赞许，有人问他：“《书》解谁者最好？莫是东坡《书》为上否？”他说：“是的。”又问：“但若失之简。”他答：“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又说：“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东坡《书》解文义得处较多。尚有粘滞，是未尽透彻。”可以说是充分肯定了。

朱熹称其“文势好”，是指他能把握文句的整体意思，做到语气贯通，辞意不绝，意蕴鲜明；称其“文义得处较多”，是指对《尚书》这类古奥的、用上古文字写成的文章，能够准确理解，将其义理传达得清楚，解释得正确。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称赞：“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而又长于议论，故其诠解经义，于治乱兴亡之际，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

林冠群认为：“与历代众多学人的《书传》相较，《东坡书传》不仅释义明白，简洁浅显，且视角独特，见解超群，是值得信赖的版本。”

《东坡书传》传递的人文理念

林冠群看到《东坡书传》最能显示其独特视角，与历代大儒所见不同的地方，在于对“人”的认识上。

“大哉人乎！”这就是东坡对“人”的认识。《尚书·泰誓》（以下引文只提篇名）里也曾提到“惟人万物之灵”。东坡在他的《书传》中时时提到人的作用，认为“古之天者，皆言民也”（《说命中》），明确提出：“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无险于民者。”（《召诰》）“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五子之歌》）

林冠群说，东坡晚年奋力所著《东坡书传》一书，其实已经借此书充分表达了他对北宋政局乃至历朝历代有关政治得失的看法与思考，其中高明深邃之处早已超越前贤，独标卓识，诚如苏辙所云“多先儒之所未达”。

在《梓材》一篇中，东坡的诠解，坚持“以人为本”的意识，引《易经》：“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句，主张“以德治民”，反对杀戮，反对以暴力对待群众，坚持“宁可放过有疑罪的人而不可滥杀无辜”。告诫一切统治者“以杀为戒，以不杀为德”。林之奇对此大加赞叹：“苏氏之言，其有功于教化者，此类也夫！”

《东坡书传笺译》价值何在？

2022年，中华书局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刘尚荣（1939—2023）几番通读《东坡书传笺译》的书稿后，为该书撰写了序文。

刘尚荣在序中写道：“历来对《尚书》的诠解，大都纠缠在字词章句的训诂解释上，结果是歧见百出，莫衷一是，有时甚至是矛盾抵捂，无法贯通而归于无解。林先生笺译此书，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省去了繁琐注解训诂一环，直接以东坡原解为据，转译为现代汉语，使读者可以直通经文，了解原意。通观林先生所译，基本忠于原著，相当于直译。而精妙通灵之处，甚得坡翁神韵，个性鲜明。”

如《洪范》一篇，经文有“皇建其有极”句，东坡诠解为“大立是道，以为民极”，林冠群转译为：“大立‘皇极’之道，以此为民众树立大中至正的治理目标。”然后，他援引各家解释：皇极，按东坡此段的诠解，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儒家所谓“大中至正”的治民之道。意即执政标准必须将“无私、公平”二者做到极限的程度，无丝毫偏差。这里的立足点在于民，要使民众从“大中至正”的“皇极”中受益。

刘尚荣认为林冠群对这段经文的阐释不仅道出了东坡的“为民立极”的正确主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清以来，儒家学者们溺于章句的某些不良倾向。

《东坡书传笺译》一书的出版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李忠良认为，林冠群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即致力于苏轼研究，海南儋州为苏轼晚年贬谪之地，林先生成长于儋州，自幼即对苏轼的才情追慕不已；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染的学者，他有渴望于世有补之思，闲暇间有与友朋吟诗作对之好，视东坡为异代知己，故先后有500余万言的著述问世；《东坡书传》集中体现了苏轼对北宋政局乃至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有关政治得失的看法和思考，在《东坡书传笺译》一书中，林先生赓续东坡精神，广征博引、诠解雅驯，是苏学研究的新成果，读者可文白互参、反复阅读，体味东坡魅力，提高个人修养和管理智慧。

“《书》学之难，本来难于上青天，林冠群先生厚积薄发，以40余年来沉浸于苏学研究之积淀，诠释经典，体悟先贤的思想境界，八十高龄还出此巨制，实在是后辈治学的楷模。”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主任周泉根表示，“《东坡书传笺译》一书，既是凿空之举，让人看见《书》学研究的新领域，又是破壁之举，达到苏学研究的新境界。”

笔砚清玩

齐白石画咸蛋

■ 缪士毅

吃咸蛋，为端午时节的民俗之一，至今仍盛行不衰。端午临近，翻阅《齐白石画集》，欣赏齐白石笔下的咸蛋，也令人馋涎，平添端午韵味。

齐白石是中国近现代画坛极富传奇色彩的画家，擅长绘画花鸟、虫鱼、蔬果、山水、人物，以及传统节令中的风物，融诗、书、画、印为一体，被称为中国画大师，20世纪中国十大画家之一。端午节的风物可入画者较多，如菖蒲、艾叶、枇杷、粽子、咸蛋、雄黄酒等。不过，咸蛋是齐白石油笔下出现较多的端午风物之一。

齐白石创作的《咸蛋蟑螂》，现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创作于1941年，尺寸为29cm×22.5cm，题款为“白石老人作”。从画面上可见，上方画两只包裹黄泥的咸蛋；下方画一只小蟑螂；中部置一大瓷碟，碟中搁四瓣切开的呈船状咸蛋，蛋白、蛋黄分明，红色的蛋黄成为画面凸显的亮点，分外明艳，顿使画面生辉。细细分析一下，齐老在此画面中画一只蟑螂，不仅仅为画面增添几分动感，更有较深寓意，或许是这切开的咸蛋美味过于诱人，引得蟑螂想赶来品尝；或许意指时临端午，因为蟑螂是“四害”之一，端午为蟑螂繁殖较盛的时候，提醒人们要讲究卫生，清除蟑螂危害。

著名画家齐白石出身农家，从小耳闻目睹乡村端午风情，他用自己手中的画笔，绘画了许多与端午有关的作品，如他所绘的《端午》《端午美味》《五日吉祥》等画作，将粽子、咸鸭蛋、菖蒲、艾草、雄黄酒等端午应景之物，单独或组合搬上画面。这些应景之物是齐老看过或体验过的东西，透露着一种农村端午的浓浓乡情味。在绘画天地，画咸蛋的绘画大师，恐怕没有几个，但齐白石是其中的一个，尤其是端午题材中的咸蛋。齐老笔下的咸蛋，以寥寥数笔画出了属于自己的咸蛋味道。瞧，画面上那被切开的咸鸭蛋摆放在盘里，那白嫩的蛋白，流油的蛋黄，真让人馋涎不已。

咸蛋又称腌蛋、盐蛋，加工咸蛋以鸭蛋为多。我国食用咸蛋历史悠久，唐代孟诜说，鸭蛋“盐藏食之即宜人”。宋代苏东坡在扬州做太守时，专门做了一首诗《扬州以土物寄少游》，诗中写道：“凫子累累何足道，点缀盘飧亦时欲。”这里的“凫子”，即风行当地的咸鸭蛋。明代李时珍说：“俗传小儿多痢，炙咸鸭卵食之，亦间有愈者。”清代文学家和美食家袁枚认为：“腌蛋（即咸鸭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咸丰时杭州人施鸿保有诗句：“盐腌鸭蛋满膏油，黑透黄儿更耐留。”道出了咸蛋的美味。

端午节民间有吃“五红”的习俗，“五红”之中就包含咸鸭蛋。而江南民间端午节还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及雄黄酒。不论是“五红”还是“五黄”，都包括咸鸭蛋在内。民间在端午裹粽子时，有些地方如海南儋州，还有以咸蛋入粽子馅的做法，民谚甚至有云“吃了端午咸蛋粽，才把冬天棉衣送”，俨然把端午节作为正式入夏的分水岭。

端午又临，品赏齐白石笔下的咸蛋，品的不仅是咸蛋滋味，更是民俗文化韵味。

齐白石画作《咸蛋蟑螂》。
缪士毅翻拍自《齐白石画集》

史志琼崖

苏轼为何等了七天才渡海？

且待潮起顺海流

■ 蒙乐生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底，苏东坡遇赦北归，他给友人赵梦得留下手札：“轼将渡海，宿澄迈……”时为当年的六月十三日。可是，写完手札后的第七天，苏东坡才渡海北上，他在等什么呢？

原来，他在等过海的渡船，也在等“望历下弦前后”的水文环境，也就是在等“一帆济海，半日可到”的渡海时机。

《新唐书·地理志》载，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广州通海夷道”。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向西南方，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越过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

自宋代开始，中国海船异军突起，频繁穿梭在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上。中国海船宽大、稳定，设备优良，特别是指南针的发明，保证航船安全，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苏东坡辞世后的20余年，宋徽宗派遣徐兢出使高丽，命令明州的招宝山船场建造“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和“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每艘船舱分三层，水手180人。徐兢等人乘“神舟”到达高丽，引起高丽朝野震惊。在船上，徐兢把自己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瞑，则用指浮针以揆南北。”也就是说，晚上航船根据星斗辨别方位，天气昏暗就用指南针推测航行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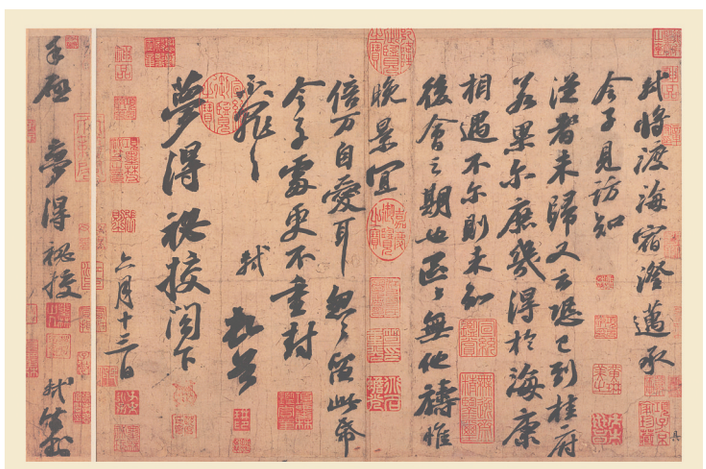
由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丰富的海洋航运经验，因此，到苏东坡南渡北归时，船家横渡琼州海峡，运用海流水文、海洋知识来指导航行，也就不足为奇。这在海南历代志书中，也有相关的航行认知。

千百年来，海南人对潮汐现象的认知不断加深，积累了丰富的潮汐文化，构成海南海洋文化的重要部分。明代临高举人王佐《鸡肋集·海边纪行》称：“外家家住海南边，垂老频来岂偶然。几个渔舟依海港，两三灶户傍盐田。潮痕每准星长短，水候仍催月次躔。”王佐生长在海南，熟知海洋水文，他不仅善良悲悯，著书立说，还为渡海居民指点迷津。

王佐《鸡肋集》的《海南潮候前论》一文就提到，琼州海峡的潮水半月东流，半月西流，潮汐的大小与涨落是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变化的。

万历《琼州琼志》记载：“琼州潮候，与江、浙、钦廉之潮不同，其地势异也。郡与徐闻对境，两岸相夹，故潮长则西流，消则东流，日则消长，常也。八月、九月其势独大，每日两有消长者，其变也。故旧潮渐减渐小，谓之老潮，新潮渐退渐大，谓之穉潮。十一月朔，或时不测而长，谓之偷潮。其大小之候，随长短星，不系月之盛衰。”

清初屈大均通过观察潮汐的变化，得出的规律更加直接明了：“琼州潮，每月不潮不汐二三日，冬不潮不汐三四日，八九月潮势独大，夏至大于昼，冬至大于夜，二十五六潮长，至朔而盛，初三大盛，后渐杀；十一二后长，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后又渐杀，大抵视月之盈虚为候……”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轼要在六月二十日渡海了，因为彼时不但是顺流，而且潮水也大，可以安全、快捷地抵达徐闻。



苏东坡《渡海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